



# 教职工政治学习参考资料

(2021年第5期)

党委宣传部编

2021年6月1日

# 教职工政治学习参考资料

(2021 年第 5 期)

苏州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21 年 6 月 1 日

## ● 学习内容

红色保密史专题学习

警示教育案例专题学习

## ● 参考资料

- 一、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一）：井冈山：胜利的起点..... 2
- 二、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二）：瑞金：万里长征第一步..... 9
- 三、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三）：延安：热血厚土..... 16
- 四、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四）：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23
- 五、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五）：蔡叔厚与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 30
- 六、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六）：钱壮飞：深入敌营情报中枢 冒死挽救党中央..... 33
- 七、微信办公请注意！多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36
- 八、不容忽视！涉密会议保密管理应该这样做..... 41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一）：井冈山：胜利的起点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缓慢行驶，环顾四周，云蒸霞蔚，满目苍翠。蓦然间，一个巨大的火炬跃入眼帘——期盼已久的井冈山到了。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 年，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伴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党着力加强保密工作，坚持武装斗争，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会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 一封密信指引的道路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受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9 月 9 日，秋收起义打响，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红旗的队伍开始在失败的挫折中艰难前行。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正如毛泽东名作《西江月·秋收起义》所描述的那样，起义军兵分三路，目标直指长沙，但轰轰烈烈之后，暴动很快遭受了失败。

起义军在艰难地攻占醴陵、浏阳之后，遭到强敌的疯狂反扑。各路起义部队损失惨重，由原来的 5000 人锐减至 1500 人。

面对强敌的围攻和起义的挫败，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文家市召开前

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9月20日，出发前的起义军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召开大会，由师长余洒度宣布了退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作了“小石子终究打破大水缸”的鼓舞人心的讲话。然而，起义军官兵对于退往湘南，仍然有不同的思想情绪。

几天后，起义军在南下路上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四五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7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这对于刚刚经历秋收起义失败的起义军，无疑又是一场严重挫败。尤为严峻的是，起义军一路跋涉，伤病员不断增加，战斗力明显下降，而敌军围追堵截之势不减，军心开始涣散，消极情绪蔓延，一些人也离开了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决定绕道芦溪向莲花县前进。

“从攻进莲花县城到迅速转移，起义军仅用一天。就因为在这一天当中，出现在此地的一个人，一封信。信用密写药水拟就，晾干后看不见，放在水里可见。具体内容只有毛泽东和写信人知道，就连送信人——时任浏阳义勇队中队代表宋任穷也不知道。写信人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信里说，如果起义军有困难，可以到江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指挥的十几条枪。”井冈山市党史办副研究员刘晓农说。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证实。

中共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密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

很大的导向性作用。虽然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我上井冈是中途逼出来的”，但中共江西省委的来信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为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

一封密信帮助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将秋收起义部队的退却终点由湘南改为井冈山，使他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把武装力量带到农村区域的党内“第一人”，揭开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的伟大序幕。这是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战略决策，为革命战略的转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 在斗争中强化保密

井冈山茅坪村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卧室里，两篇光辉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静静地躺在书桌上。人们仿佛又看见毛泽东在点着一根灯芯的青油灯下，奋笔疾书，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随着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井冈山时期的保密工作也日益得到强化。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鉴于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红色区域得以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但一些地方在发展党员过程中，采取了粗放式发展策略，公开党的组织，简化组织程序，甚至用“拉夫式的吸收办法”公开招收党团员，致使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8月，敌人反攻倒算，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有

的甚至出卖党组织，带领敌人到处捉拿党内同志，党组织大半被破坏。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对党组织进行整顿。从 9 月开始，厉行‘洗党’。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具体程序是，在宣布原有党组织解散后，由县委或特委派下来的干部指定支部召集人，再由这位召集人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哪些人参加重新登记。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或参加登记的人，就算已被除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孙伟介绍说。

各基层党组织完成重新登记、造册上报的程序后，开始转入秘密状态，不在社会上公开，党员要严格保密，不可泄露谁是党员、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吸收新党员也必须秘密进行。此次“洗党”被清除出党组织的人员约 4000 人，虽“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指出。

同时，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恢复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边界特委建立了 3 条秘密交通线。第一条是从湖南衡阳经耒阳、安仁、炎陵至井冈山，接通了与湖南省委的联系。第二条不仅用于沟通与湖南省委的联系，还沟通了萍乡、安源两地。第三条从井冈山经永新、吉安、南昌到上海。这 3 条交通线分属湖南、江西两个省委，由此可以看出，边界特委建立了双保险的秘密交通线，目的就是确保边界特委与外界联系不中断。

对于根据地内部的反奸防谍及通信联络，边界特委组建了边界防务委员会具体负责。“边界防务委员会在每个县、区、乡选择秘密联络点

层层设立递步哨，并精心挑选了一批交通员，规定各地的信件、物资等必须由交通员一站转送一站，各哨口必须保持警戒，严格执行检查手续，保证信件、物资等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同时，严令各哨口，没有各级机关的外出证明，任何人不得放行，出入都必须严加盘查，防止敌人混入。”井冈山市党史办副主任陈学林介绍说。

记者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一份不同寻常的证件。这份证件用红绸布制作，长12厘米，宽7.5厘米，证件上写有“交通欧阳倬”5个字。

“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交通员欧阳倬使用过的一份红色交通证，更是当时党的秘密交通的重要历史见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研室副主任何小文说。

据何小文介绍，边界特委还十分注重宣传发动群众，甚至让群众参与到保密工作中。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利用红四军主力外出未归之际，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为了反击敌人，边界特委曾提出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其中就特别提到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取得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泽东在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的途中，听到了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欣然挥笔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篇。

### 用生命保守秘密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保守党的秘密就成为入党誓词的重要内容。在硝烟弥漫的井冈山斗争时期，面临生死考验，无数共产党员、革命志

士用生命捍卫了这一誓言。

刘仁堪，男，江西莲花人。1928年11月，刘仁堪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9年5月被捕。敌人先是诱降，声称只要刘仁堪交出全县共产党组织及党员名单，交出红色独立团的枪支，就对其委以重任。刘仁堪始终不开口，敌人一无所获。5月19日，刘仁堪被敌人公开杀害，临刑前他痛斥敌人，被敌人割去舌头，血流满地，遂用脚蘸鲜血书写“革命成功万岁”6个大字，英勇就义。

谢甲开，男，江西宁冈人。1928年1月，谢甲开任宁冈茅坪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秘书，不久，任中共宁冈茅坪乡支部书记。1928年3月，毛泽东和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兵分三路，进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部队离开边界后，宁冈兵力空虚，当地土豪和国民党军乘机卷土重来，扬言要血洗茅坪。为掩护村民转移，谢甲开不幸落入敌手。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说出茅坪乡党政干部的去向，谢甲开严词拒绝。最后，谢甲开被敌人残忍地剖腹开膛，挖出心肝，碎尸五段，抛入河中。

聂槐妆，女，湖南炎陵人。1927年，聂槐妆嫁到宁冈茅坪，1928年，随丈夫参加革命，担任茅坪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为解决红军缺盐问题，聂槐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首先把盐浸入水中，化成盐水，然后把一件吸水性非常好的新棉衣放进盐水中，待衣服充分湿透后再晾干。然后，聂槐妆穿上晾干后的棉衣，罩上一件外套佯装走亲戚，一路顺利通过敌人的关卡，将食盐秘密送给了红军。在聂槐妆第三次为红军送盐时，狡猾的敌人起了疑心，便将她抓了起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聂槐妆毫不动摇，守口如瓶。敌人见用尽各种手段也没有



任何收获，就在茅坪坝上将她枪杀，牺牲时她年仅 21 岁。

吴月娥，女，湖南炎陵人。1927 年 10 月，16 岁的吴月娥参加了打土豪、支援红军的斗争，担任了荆竹山乡的少先队队长，领着一群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看护伤病员。1928 年 6 月起，吴月娥成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交通员。1929 年 1 月，在返回荆竹山途中，吴月娥被敌人抓捕。敌人用刺刀顶住她的后背，威逼她带路去找红军躲藏的地方。早已抱定宁死不屈的吴月娥领着敌人走了一个半小时，登上了一处悬崖，乘敌不备抱住敌人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年仅 18 岁。

井冈山还有很多这样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沿着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记者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吊唁大厅。这座五角星型的建筑里，6 块巨大的黑色石碑环屋而立，石碑上镌刻着 15744 名烈士的姓名。正中间，横亘着一块光洁如玉的大理石“无字碑”，以无言的方式悼念着另外 3 万多位无名烈士。

看着墙上一张张肖像照下简单的生平介绍，记者心痛不已。他们大多 20 多岁，却永远凝固在一张张黑白照片中；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到来；他们在无尽的黑暗中高举火把，却在日出东方的前夕永远闭上了双眼。

致敬，井冈山！一座承载光荣、走向胜利的英雄之山！

（来源：转载自《保密工作》）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二）：瑞金：万里长征第一步

“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从这句党史专家常讲的话可以看出，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瑞金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血雨腥风里、烽火连天中，这片红色的土地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红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见证了保密工作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瑞金时期，我们党从国家管理保密工作的层面进行探索，丰富了管理经验、培养了管理人才，为之后各个历史时期民主政权的保密工作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一苏大”的真假会场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进军赣南，随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此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的筹备工作来看，处处显露出苏区中央局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大会的保卫工作分外线警戒、内线警戒两部分，警戒的目的就是严防泄密，确保会议顺利召开。会议的保卫和内线警戒方案由钱壮飞和欧阳毅起草，经政治保卫处领导研究确定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提笔写下两个字：绝密。

“在这个方案里，最为知名的就是‘假会场’的设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介绍说，“它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原

来，“一苏大”的会场还设计成了“双黄蛋”。

记者一行来到了真会场的所在地——瑞金叶坪的谢家祠堂。放眼望去，四周古树参天，如果从空中俯视，很难被敌机注意，十分利于隐蔽。而假会场的周边情况正好相反，选取的是闽西长汀一处树木稀疏的开阔地带，位置很醒目。据介绍，当时假会场的布置程度不亚于真会场，“大动干戈”地插满了红旗和条幅，看起来红红火火。于是，即将在长汀召开大会的假消息很快就散播出去了。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一苏大”正式召开的日子。早上8点钟，阅兵式刚刚结束，在真会场就响起了防空警报，人群立刻有序疏散。一会儿，一群敌机飞来，掠过上空后，径直朝长汀方向飞去。随后，一阵狂轰滥炸，假会场陷入火海。消息传来，大家兴高采烈地说：“一些彩纸彩带就换了敌人不少炸弹，这个‘交易’啊，真划算！”

11月19日，在610名与会代表的见证下，大会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

### 跳动不息的红色血脉

“一苏大”召开时，周恩来尚未现身瑞金。到了1931年12月，他一路乔装打扮，变换画像师、商人等身份，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终于抵达了红色首都。他们一行所走的路线，是党史上著名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战乱频仍时期，

上海通往全国各个苏区的交通线大都因为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中断，唯独这条连接了上海和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虽绵延数千里，却幸免于难。

这条秘密交通线在护送领导干部、运送紧缺物资、传递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生动地比喻成人体的“血脉”。除了中央红色交通线，还有一条“血脉”也值得一提，那就是红色邮政。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在其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邮政网络和业务活跃起来。以瑞金为起点，省际间和省内的6条邮路投入使用，业务涵盖普通邮件、挂号、包裹等。

维持红色“血脉”跳动不息的是英勇的交通员，交通员们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冲破重重障碍，保障了红色“血脉”顺畅运行。当时，由于敌人封锁，交通员们有村不能进，只能绕着走，白天不能走，只能晚上摸黑走。他们常常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为防止敌人发觉，还要注意消除走过的痕迹。除了党的文件、情报和宣传品之外，在敌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的严密封锁下，交通员们还隐蔽地传送着粮食、布匹、药品、无线电器材、电池、收发报机、印刷设备等民用和军用物资，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红色“血脉”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有200多人，运往苏区的物资超过300吨。有了红色“血脉”的存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就更添了活力。跳动不息的红色“血脉”，不断地给中央苏区输送着养分，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既是供给局部的、又是事关全局的。

## 国家秘密金库

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要立稳脚跟，必须要有经济后盾的支撑。无论是红军的生存与壮大，还是政府的运转和发展，面对风云变幻的战争形势，都需要大量资金。为此，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金融举措，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国家秘密金库。

在哪建？怎么建？如何维护？哪一步不周全都会招来灾祸。最后，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筹划下，一个精心设计的樟油加工厂悄然出现，而它的地窖就是秘密金库。

这个樟油加工厂距离瑞金叶坪 40 余公里，位置偏僻但交通便利，并且当地社情相对简单。厂里有两个固定的加工师傅和若干个临时工，生意不大不小，时而有些老百姓前来送原料。看似一切正常的表象，背后却蕴含着玄机：两个固定的师傅是政治保卫局派遣来的，他们本身确实会加工樟油；临时工是秘密金库的保卫者，不定期进行更换；来送原料的老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国家银行或政治保卫局的便衣，他们送来的却不是原料，而是造币厂造好的银元或者打胜仗缴获的钱款。就这样，这个毫不起眼的樟油加工厂秘密而安全地守护着大量的苏维埃共和国资金，直到红军开始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时才结束作为秘密金库的使命。

为了防范敌人对苏区经济的破坏，毛泽民在领导设计苏币防伪标识时，还留下了一段保密轶事。当时，采用了两个秘密的防伪办法。一个是在钞票下方有一行“外文”，看起来像是毛泽东和邓子恢（时任财政部部长）名字的英文书写，其实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这行“字”中，特意加入了几处杜撰的写法，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又实用的防伪办法。另一个就是在印钞纸中加入羊毛，使其具有特殊的气味。这两个秘

密严格控制了知悉范围，只有 4 人掌握——毛泽民、项英、邓发以及钞票设计者黄亚光。

在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期间，由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确保了秘密金库和苏币的安全，为支援红军前方作战和苏区政府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 突破“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

1934 年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在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实施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这项计划拟集结 150 万大军，在距瑞金 150 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内推进，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彻底歼灭。

铁桶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我党地下工作者项与年深知其中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在得到这份绝密情报后，立刻动身赶往瑞金。他一路上风餐露宿、马不停蹄，但是发现越靠近瑞金，敌人的封锁越严密。为了能闯过关卡，心急如焚的他抓起地上的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 4 颗门牙。这样，他满脸鲜血、双腮肿胀，再加上蓬乱的头发、褴褛的衣裳和手中的馊饭，与乞丐无异。沿途的敌军哨兵看到，远远地就捂着鼻子赶他离开。于是，在 10 月 7 日，他终于到达瑞金，把绝密材料及时送到周恩来手中。这份情报表明，红军已经面临着极度危急的形势，必须尽快完成转移突围。

实际上，同年 5 月，中央书记处就根据形势，作出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并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并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

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在“一切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具体包括扩大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派出先遣部队探寻路线等。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展开秘密谈判，达成借道的口头秘密协议。

8月，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该规则的下发，一方面是对红军撤离苏区行动进行保密工作部署，另一方面是对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作出制度性规定，同时也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对全党进行的一次保密教育。

### 30万百姓守护的惊天秘密

在瑞金，随处可见革命文物，随处可闻革命往事；户户都有自己的红色故事，家家都有怀念的革命亲人。在反“围剿”的时候，老百姓严守红军去向的秘密，千方百计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在戒严戒备的时候，群众自发站岗放哨，警惕一草一木；在红军需要情报的时候，群众利用合法身份进入白区进行打探、收集……

一位国民党士兵在其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进入苏区后，一个群众也找不到，一点吃的也找不到，一个向导也找不到，只听得到狗叫的声音”。瑞金党史办专家毛瑞明就此感慨：“保密工作时时、处处离不开群众，也正是因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党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在这个时期，最能反映我们党深厚群众基础的保密往事，莫过于 30 万于都老百姓共同保守红军长征出发这一惊天秘密的动人事迹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集结，准备横跨于都河，踏上长征路。怎么才能安全跨过 600 余米宽的江面呢？瑞金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严帆告诉记者，当时采用的是搭浮桥的办法——下面是并排的船，上面铺设木板。当地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床板都卸下来，甚至有位老先生，把自己的寿材也捐了出来，支援红军渡河。

从 10 月 17 日到 20 日，渡河行动总共持续了 4 天。出于保密考虑，白天战士们隐蔽在树林里，到晚上才出来搭建浮桥，趁着夜色过河，然后在凌晨太阳升起前拆掉浮桥，并把河滩上的脚印等痕迹清理干净。

8.6 万名红军搭桥过河，再隐蔽的行动也“声势浩大”，然而却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可以说，是于都县 30 万老百姓上下齐心，确保红军安全地踏上长征路。

采访结束时，记者收到了于都县保密局同志转来的一首诗：“每一块木板都可能成为告密的云，每一朵浪花都可能变成泄密的风，每一片树叶都可能成为背叛的虫。可是没有，就连流浪的鸟雀，都蹲在远远的山头，成了望风的岗哨、报警的钟……”读着读着，记者仿佛又回到了那片红色的土地，一行行的诗句，亦如江水涛声，久久回荡在心田。

（来源：转载自《保密工作》）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三）：延安：热血厚土

蜿蜒的铁路穿过高山和沟壑，带着我们驶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5 年至 1948 年，党中央及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战斗、生活了 13 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是现存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完整的。而战时军事行动与隐蔽战线工作的一体化，使延安的 445 处革命遗址中满是保密往事。

### 窑洞里的保密思想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故地相距不过数公里，除少量集体办公用房和一座礼堂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土窑洞。而窑洞中除了炕，大多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有的壁上挖出一个小凹槽，那就是干部、战士们的“书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这里呱呱坠地，并且生发了囊括防间反特、秘密交通、电台工作、地下工作等重要内容的战时保密思想，确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初到陕北时，中日战事、国共矛盾一触即发，红军却人数锐减，成了“皮包骨”。敌强我弱，我党我军各条隐蔽战线不得不加速发展，文档、机要、交通、政保、情报、统战等多方面的保密问题成了党中央领导人关注的大事、要事。

据查，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在这一时期就保密工作作出专门论述，但多次对其进行部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保密工作题写了“保守机密，

慎之又慎”8个字。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强调，要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指出没有秘密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就失了灵魂。

无独有偶。作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刘少奇也十分重视科学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到华北后，他撰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30余篇系列文章，并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先后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特点、任务、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进行论述，丰富了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理论内涵。

而周恩来则更具体地指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者开展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比如，他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对白区工作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对机要工作提出了“必须干部与技术结合”的要求，等等。

基于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这一时期保密工作的制度发展也令人瞩目。翻开这段档案，党中央每年、甚至每几个月，就要研究出台关于保密的具体规定，各军也纷纷制定了各自的保密章程，内容之细致、周全都是从前未有的。

## 防间锄奸

陕甘宁根据地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是敌人的“眼中钉”，饱受滋扰。一方面，日本为了配合对华军事侵略，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特务机构，更在山西组建特工培训点，时常派人到延安及陕甘边区潜伏，进行窃密、

暗杀和投毒活动。仅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延安保卫机关便侦破日军特务间谍案 73 起。另一方面，国民党假借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之名，挑选精兵强将潜伏入延，试图搜集我高层秘密情报，中央军委二局、延安联防司令部、边区保卫处、中共陕西省委、抗大等都有他们的踪影。胡士渊特务小组甚至将电台隐蔽在了中央军委二局，在党中央眼皮子底下与军统机构拍发情报。一时间，延安谍影幢幢，记者、商人、僧侣、乞丐、教师、“进步青年”，都成了他们的伪装。

为了反击日军和国民党的渗透、破坏和窃密，中央在党政军内部开展了防间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动，并于 1939 年成立了反特工作领导机构——社会部，制定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等一系列章程，反复强调干部审查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更提出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连续刊登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方法及保守秘密的注意事项等，宣教力度空前加大。同时，延安及周边的保卫工作也更加严密，可谓“全民皆兵”。

据介绍，锄奸工作最严的时候，进入延安必须有手信或者路条。村口边、小路上，到处都是放哨的老人、妇女特别是儿童。史料记载，这里的儿童经常帮助边区自卫军监视敌人，严查过往行人的通行证明，如果发现可疑之人，便立刻按照少先队的纪律处罚或者向自卫军报告。到了晚上，军民联合挨家挨户地清查人口，盘问登记，铺网之严，使敌人闻风丧胆。

而在处置特务间谍的司法程序方面，党中央提倡感化劝导，禁止“逼、

供、信”，政策比较宽厚。因此，大部分特务间谍在经过教育后被改造成了抗日人员，成为党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声泪俱下地公开忏悔，情理兼备地说服了多人自首。

## 秘密交通

深夏时节，洛川山清水秀，苹果、大枣等果实缀满枝头，丰收的景象尽在眼底。然而 80 多年前，这里的荒凉贫瘠却如同噩梦。干部和战士们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点的是小油灯，面对的是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了消除物资困难，党中央厉行节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过，我们向苏联争取的一大批军用物资，包括 5 万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几十门大炮等，却因交通线中断而始终没能运至边区。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更迫切地需要与各根据地及国统区、沦陷区沟通联系，尽快恢复重建党内秘密交通成了当务之急。

1940 年 6 月，中央交通局恢复，为了保守秘密，便对外称为“中央农委”。这一时期的中央交通局在工作职责上更加明确，就是直接服务于党的中央机关，保证党中央与各根据地、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络畅通；在工作任务上更加集中，主要担负重要秘密文件传递、干部护送和物资运输工作；在机构设置上，不再分内线交通和外线交通，而是分国际交通和国内交通。

为了保证中央干线畅通安全，当时的交通局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比如规定中央交通干线为秘密交通线，交通员必须以各种形式进行掩护，等等。交通员除了化装成各种身份的群众外，有时候还要扮成敌伪人员，

因此平时的工作也包括搜集敌伪人员身份证件及衣物等，随时准备“隐形”。

“延安流传的秘密交通故事特别多。”当地党史工作者成云说。而延安老乡最津津乐道的，就要数七大代表“小长征”的故事。

受战局、党内外关系的各种影响，中共七大的筹备历时多年。当最终决定召开时，各地代表如何通过沦陷区和国统区到达会议地点又成了棘手难题。为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各地党委、军区，要求搭建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网。七大的筹备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大家的身份和行程都严格保密：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有的化装成农民、乞丐。而代表们抵延的路途更是险象环生、艰苦卓绝，他们中有的经国外辗转而来的，有的是被敌区爱国势力护送而来的，还有的是靠着一双脚底板徒步一年多走来的。

### 红色电波

从延安市区北去不远，是以隆隆腰鼓扬名的安塞。革命烽火中，这里曾有另一群“好后生”，用电波做槌、时间做鼓，开辟了无形的“空中战场”，在隐蔽战线的新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党中央主动转战陕北与敌周旋。国民党妄图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竟然网罗到一批外国专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不断侦察我党我军电台方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任弼时、王铮等发现情况有异后，立即对该设备展开调查研究，摸清了它的特性，随后制定了新的密码方针和通信联络方案、保密制度，利用敌人迷信无线电测向的心理，把各军司令部原有的大电台都移开，

改用敌人无法侦测的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此外，他们还在相距 60 华里的地方设立两架电台交替发报，将计就计，把敌人骗得团团转。

与此同时，我方无线电技侦的攻势也逐渐摆开。党中央全面铺开了情报网，重点加强对国民党重要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尤其注意整合战略情况。各军的情报分支机构，每隔三五天便向总部汇报一次收获，前线部队也将缴获的敌方先进设备、电台人员等都送到中央后委，以供集中研究。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利用他们送来的这些设备，我党我军很快就发展起自己的测向技术等，并且创造性地构建起无线电通信联络网，继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添了一大把柴。

### 燎原之火

“党中央虽在延安，党领导的地下党员却遍布全国。最终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的！”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得到了一些从前未曾注意的线索。

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内争取力量、静待时机，是延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熊向晖、沈安娜、阎又文等一批英雄人物源源不断地为党中央输送情报，但还有更多的无名地下党员，通过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建立了反侵略、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战线，在漫漫长夜中引领人民迎接曙光。

1937 年，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里特别提到，要采取“灰色”的办法，根据具体情况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和群众工作之中。按照这一原则，党中央重新划定了相关保密工作，规定军队

中的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中的“党团”都是保密的，各地党员的数目也是保密的。以延安为中心，全国的地下党员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半秘密的方式在各种工人运动、爱国运动中汇聚民心。

为更好地进行统战，党中央还在全国开展起地下宣传活动。1939年，党中央建立发行部，正式在敌占大城市中秘密发行《解放》《中国文化》等党中央出版物和其他机关出版物及宣传品。谨慎起见，这些发行人员、巡视人员都是由各党支部挑选的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共产党员，散发的读物也常用老寿星图样或课本封皮包裹，进行化名。据说，这个时期党的一份揭露日军凶残行径的画报，曾因激发了广大爱国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斗志而引得日军恐慌，可见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成效显著。

星星之火终燎原。如今，战火纷飞的年代早已过去，但延安13年留下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仍然熠熠发光。

（来源：转载自《保密工作》）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四）：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当“昆仑纵队”在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的率领下牵着胡宗南十几万军队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沟梁峁岔中兜圈子的时候，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来到冀西地区阜平、平山一带，这里是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为党中央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战略决战指挥所。

西柏坡，毛泽东在这个小山村调动千军万马，并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打开了通往新中国的大门。

为保障即将举行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成立了中央保密委员会，加强了对保密工作的领导。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统一领导保密工作的专门组织，意味着对保密工作的领导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保密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管保密工作的体制怎样调整，保密纪律，始终被一丝不苟地执行，成为护持解放战争决战决胜的一面坚盾。

### 选定西柏坡

1947年3月18日，党中央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党中央分为两部分即中央前委、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先期离开陕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率中央及军委大部分工作机构留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地区。



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后，聂荣臻极力挽留。原本要前往太行（晋冀鲁豫解放区）落脚的中央工委经中央前委同意后决定留下来。中央工委不走了，驻地选在哪里？经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机要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和晋察冀军区副官处处长余光文等人的认真考察，最后将驻地定在西柏坡，其中考虑的因素，首先是安全保密：西柏坡前临滹沱河，右倚太行山，坐落在一个马蹄形山弯里，村子不大，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密。同时，西柏坡为与平原交接的浅山区，便于与各解放区联络，距离当时敌占的石家庄尚有 70 公里，若敌进攻，可退入深山；当地经济基础较好，能够支持较大机关驻扎等。中央工委进驻后对外称“工校”（或称“工人劳动大学”“劳大”），刘少奇任“校长”，化名胡服，朱德的公开身份是“校董”。

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后，沿用了“工校”的代号。这一代号一直到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仍在使用，竟引得不少年轻人想要报考。当然，这是后话。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被迫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经过各解放区军民半年多的奋勇作战，到 1947 年底，各野战军相继发起进攻，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主动权转到中国共产党手中。在华北，随着晋察冀解放军连续取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西柏坡周边大环境的安全性骤然上升。中央十二月会议遂作出决定：中央前委、后委要与工委合而为一，会师于西柏坡。1948 年 3 月 3 日，西北野战军胜利结束宜川战役，陕北局面大为改观，中央前委牵制胡宗南的任务已告完成。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

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秘密东渡黄河。

保密上步步谨慎，尤其对中央领导要采取严格的保密保卫措施，这是十分明确的纪律规定。毛泽东一行渡过黄河后，沿途在严密的保护下，穿过晋西北经雁门关、五台山来到晋察冀阜平县的西下关村。

吃过晚饭后，毛泽东提出要见当地老乡，周恩来担心天黑有危险，代为慰问乡亲们，见面时当地干部不介绍周恩来的身份。

在阜平城南庄，毛泽东、周恩来等召开了小型的土改座谈会，会后周恩来谆谆叮嘱参加座谈的3名县委书记：如果有人问起是否见到毛主席，应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原河北省副省长（时任冀中献县县委副书记）韩启民在《难忘的西柏坡之行》一文中回忆：在中央妇委门前见到毛主席时内心无比激动，但在公开场合又不能表达出来。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如履薄冰般谨慎的必要性，危险以突然的方式降临。5月18日早晨，在城南庄，熬了通宵的毛泽东刚刚休息，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两架B25中型轰炸机突然窜至城南庄上空。聂荣臻等人迅速用担架将毛泽东抬进后山的防空洞，4颗炸弹随即落下来，其中一颗在院内爆炸。如此精准的轰炸，使大家意识到是内部泄密造成的。当晚，毛泽东等人摸黑转移到10里外的花山村，那是一个抗战时的堡垒村，位置十分隐蔽。8天后，毛泽东前往西柏坡，与其他几位中央书记会合。

记者来到城南庄这座闻名全国的小院——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五六百平方米的院子，有三排房子，毛泽东住在最里一排。院中一棵挺拔的老槐树下有一个浅弹坑，距主席住的房子仅10米左右，房前碗口粗

的廊柱上有三四个弹片打出的小洞。该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告破，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刘从文和大丰烟厂经理孟建德告密所致。两人已被国民党军统保定站策反，最终受到了严厉制裁。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馆员赵福山告诉记者，在西柏坡，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整体上处于保密状态：“中央和军委在西柏坡住了将近1年，附近的老乡发现这个院子老同志多，当官的多，带短枪的警卫多。但都是谁，多大官，却不知道。地方政府99%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中央在西柏坡。”

### 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

西柏坡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大决战。

面对日益于我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央和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为迅速将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为即将举行的战略决战在思想上、组织和物质上作准备。会议明确提出加强中央对各大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纪律性的要求。

早在1947年7月，中央即成立中央机要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1948年5月，中央保密委员会在西柏坡成立，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统一领导保密工作的专门组织。随后颁布的《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规定：中央保密委员会是“协助中央、军委进行有关我党我军机要电讯保密事宜，成为中央秘书长及军委总参谋长领导保

密工作之直接助手”。

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总负责人为周恩来、任弼时和杨尚昆，主任为李克农，委员为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大战在即，成立统领全党全军的中央保密委员会，说明党中央看待保密工作，尤其是机要、情报、通信领域的保密工作，已经上升到战略、核心的高度，以适应接下来的战略决战。

地动山摇的战略决战就在表面上的平静中悄悄地做好了准备。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以及大量装备、弹药和粮秣通过铁路运输，采取用“闷罐车”运输以及各种保密措施，隐蔽进抵锦州外围。同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还要求师以上部队在行动 7 天内，电台仍留在原地与上级保持电讯联络，给敌人造成我军“一切如常”的错觉。

三大战役期间，各野战军加强纪律性，严格落实保密要求；在西柏坡的中央和军委也积极发挥表率作用。毛泽东亲拟电报稿，经常通宵达旦，最多时一夜要写七八份，辽沈战役期间，他写了 46 份电报，淮海战役 63 份、平津战役 89 份，而且都亲自与机要员进行文电交接，为身边工作人员树立了严格保守秘密的榜样。

三大战役期间，总部报务员的发报量是延安时期的一倍以上，为防密集的电波信号泄露中央和军委的位置招敌空袭，将多部电台分散布置在西柏坡周边四五公里之外，除特急的 4A 电报用专线电话转述外，其余都是用人工传送。

中央和军委在西柏坡期间，共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战役 24 次、大小战斗 190 余次，共消灭国民党军队 230 余万

人，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造成了向全国进军之势。

国共大对垒、大决战，既是政治、军事的对抗，又是保密的较量。胜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 向着新中国前进

西柏坡及其周边还是新中国的演练场。为搭建起人民共和国大厦，这里开启了许多个“第一”：第一部《婚姻法》在这里起草、第一次解放区土改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第一版人民币在这里印刷发行、《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刊……

在这里，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使华北成为解放全国强大的后方基地，勾画了共和国的雏形。

在这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统一发行了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主权货币，为旧中国经济止血，为新中国建设输血。

在这里，人民政协制度奠基。1948年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猛发展，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已近成熟。中央于4月30日在西柏坡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了热烈响应，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掀起一场由国统区和香港奔向解放区、奔向光明的大出走行动。在大部分民主人士集中的香港，港英当局、美国、国民党出于各自目的，千方百计阻挠民主人士北上。

一场民主人士北上的秘密行动，在几方势力的较量中上演。为了安全离港，民主人士纷纷进行巧妙的化装，大家纷纷扮成苦力或变身阔佬各色人等。民革主席李济深声望高、目标大，被各方盯得紧，中共地下组织巧施连环计，使李济深终于成行。根据当时的情况，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香港乘船走我党开辟的海上秘密航线到大连；二是从北平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线进入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949年3月22日，毛泽东照样忙碌着，处理在西柏坡最后的事情。他在次日将要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圆满结束》新闻稿中特意加上了一句话，点明了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在保密第一，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岁月里，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共中央的位置。

七届二中全会后10天，毛泽东率领中央离开西柏坡北上“进京赶考”。保密工作继续护航，伴随党中央和军委走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最后一公里”，迈向了新中国的新天地。

（来源：转载自《保密工作》）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五）：蔡叔厚与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

1898 年出生，原名蔡肃侯，又名蔡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他出身工人家庭，曾留学日本。1924 年他毕业回国，创办了上海绍敦机电公司。1927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中央特科，1932 年调共产国际中国组从事情报工作。1936 年后因失去组织关系，长期未能恢复党籍，直至 1971 年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其党籍。

1928 年 10 月，党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无线电专家李强担负起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一个内行的人帮助。蔡叔厚当时是绍敦电机公司老板，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1929 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

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 403 号（现延安中路 369 号）。根据工作需要，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份，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唐的样子。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想要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作为老板的公开身份，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经常请国民党官僚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

这样，慢慢地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被人称为“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二

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去那里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强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决定，将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建立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

当时，蔡叔厚家和他的公司绍敦电机公司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1932年，蔡叔厚成为左尔格小组的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后因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组织被破坏，蔡叔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解放前夕，他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未果。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



(来源: 转载自《保密工作》)

## 建党 100 周年之红色保密史（六）：钱壮飞：深入敌营情报中枢 冒死 挽救党中央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丝商家庭。1915 年，他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后留京行医。1926 年经内弟张暹仲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壮飞多才多艺，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曾主演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燕山侠隐》。钱壮飞之子钱江在《忆爸爸钱壮飞》一文中写道：“爸爸经常用不同的职业来掩护革命工作，有时候是医生，有时是美术学校的教员，有时又当小报的编辑，有时还演电影。他的特长和职业变化，使他交游广泛，这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被迫携家人前往上海。1928 年夏，他参加一个无线电培训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得到同是湖州老乡的负责人徐恩曾赏识，后跟随其前往南京进入国民党情报机关。

1929 年，钱壮飞受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经过钱壮飞安排，李克农和胡底先后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李克农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胡底当上了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钱壮飞自己则驻守南京“正元实业社”，并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

就这样，三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形成一个铁三角，深入虎穴刺探情报，像一柄利剑捅进国民党的心脏。他们因此被周恩来称为情报界的“龙潭三杰”。

在钱壮飞的传奇生涯中，有一件为世人称颂的奇功——冒死挽救了党中央。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中共中央几乎全部核心机密，熟知在上海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包括钱壮飞的情况。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将是灭顶之灾。

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在1931年4月25日深夜扣响。这个周末的夜晚，徐恩曾去了上海，留下钱壮飞在“正元实业社”值夜班，他发现从武汉连续发来了6封给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和徐恩曾的特急绝密电报，凭着职业敏感，觉得其中定有大事。

钱壮飞没有多想，果断拆开密电，破译电文后震惊不已——“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押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电报中的“黎明”即顾顺章。

危急时刻，钱壮飞派我党地下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由李克农将情报第一时间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迅速做出决断，紧急转移上海的党组织，并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的联系。

为给党的转移争取更多时间，不引起敌人注意，钱壮飞决定将子女暂留南京。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都被抓捕，后因徐恩曾心虚又将其释放。

国民党本以为能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满怀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

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钱壮飞身份暴露后，撤离上海去中央苏区，从而结束了他作为一名红色特工的生涯。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在贵州乌江一带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认定为牺牲。

（来源：转载自《保密工作》）

## **微信办公请注意！多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近年来，使用手机处理公务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很多公职人员将微信应用于日常工作，不少机关单位建立了微信工作群。

微信办公确实可以为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使用微信办公导致的泄密案件逐年递增。

### **微信群泄露疫情防交办单信息被问责**

案例：湖南吉首市峒河街道计育组干部向某某在防疫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问题。2020年1月31日，向某某违反工作纪律，用手机将《吉首市疫情防控交办单》(第010号)内容拍照并将其发送至其亲属微信群，其亲戚又将交办单照片在微信上转发给他人，致使《吉首市疫情防控交办单》(第010号)照片在微信上肆意传播，造成信息泄露，引起不良影响。2月2日，向某某受到警告处分。

### **微信群、QQ工作群泄露疫情防控工作材料被问责**

案例：广西南丹县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熊某某、工作人员区某某泄露疫情防控工作材料问题。2020年1月26日，熊某某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将该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有关工作材料通过QQ发送到本单位QQ工作群。区某某发现这一信息后，随即将原文转发到其个人微信群，并被其他群内成员转发扩散，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月3日，南丹县监委决定对熊某某、区某某进行立案调查。

### **微信群发布未经核定、内容涉密的调查报告被问责**

案例：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疾控中心4名工作人员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问题。2020年2月3日，柳江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叶某某将一份未

经核定、内容涉及保密的调查报告上传至该中心的微信工作群。之后，该中心工作人员曾某某、潘某某、刘某某 3 人私自将该调查报告转发，其中曾某某将该调查报告转发至其家族微信群，其亲属再次进行转发，导致该调查报告被迅速在网络上转发传播，给柳江区疫情防控工作造成被动和不良社会影响。2 月 5 日，柳江区监委给予叶某某、曾某某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潘某某、刘某某诫勉处理；并对该中心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

### **微信群发布泄露涉疫情人员隐私被问责**

案例：广西富川县人民医院检验科负责人陈某某工作失职失责、检验员宋某某泄露涉疫情人员隐私问题。2020 年 2 月 1 日，该科室检验员宋某某（聘用人员）利用检验科细菌室电脑查询到该院感染性疾病科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患者住院病历，拍摄图片发送到其家人微信群，群内成员先后将病例信息转发到其他微信群，导致涉疫情人员信息在县域内多个微信群传播，泄露涉疫情人员的个人隐私，对涉疫情人员造成负面影响，给全县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县人民医院检验科负责人陈某某对其科室的职工疏于管理，工作失职失责，应负领导责任。2 月 3 日，富川县纪委监委对陈某某予以立案审查。

### **微信群泄露疫情排查信息被问责**

案例：广西钟山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某某泄露疫情排查信息问题。2020 年 1 月 31 日晚，杜某某擅自将一份包含湖北返贺（三县两区）人员、过贺人员信息的文件向其家庭和同学等 4 个微信群转发，造成疫情排查信息泄露。2 月 6 日，钟山县纪委对杜某某进行诫勉谈话。

## 公司微信群发布文件（讨论稿）被问责

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范某某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问题。2020年2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学校开学和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的通知》下发后，银川市政府拟恢复部分公交线路运行。在参与讨论过程中，范某某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关于恢复部分公交线路的通告（讨论稿）》发布至公司微信群，致使公司部分职工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给予范某某免职处理，银川市纪委监委在全市进行了通报。

## 微信群误发信息过失泄密被问责

案例：2020年2月1日，根据公安部门《关于泄露信息的核查通报》，内蒙古乌海市纪委监委会同乌达区纪委监委成立联合核查组，对乌达区苏海图街道相关负责人涉嫌泄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工作信息问题进行核实。经核查，乌达区苏海图街道1名负责人在开车巡查乌达区五化村卡点过程中，看到了乌达区卫健委通过微信向乌达区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群中发送的《关于做好与朱某某密接人员排查的函》后，想把此函通过微信转发给街道主要负责人，因当时正在开车，由于点击错误，误把该函通过微信转发到朋友群中，发现后及时将转发的文件撤回，但误发行为的发生仍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2月3日，乌达区防控工作指挥部对其过失泄密行为进行通报批评，由乌达区纪委监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 微信群发不实信息被问责

案例：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武穴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花桥镇柏树林村项某某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的通报》。1月22日20点17分，湖北省武穴市花桥镇柏树林村党支部委员、副主任项某某将自己道听途说的内容为“花桥现已发生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送到武汉，武穴市人民医院没有接收”的不实信息，以编辑短讯的形式发送到自己为群主的该村项献小组微信群上（微信成员81人）。随后，该信息广泛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1月23日，花桥镇纪委迅速进行调查核实后，予以党纪立案，并移交花桥派出所予以处理。武穴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武公（花）行罚决字（2020）326号）对其给予行政处罚。1月23日晚上，报武穴市纪委同意，花桥镇纪委给予项某某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 微信群编造散布虚假疫情信息被问责

案例：2020年1月29日21时19分，广西贵港桂平市罗播林业站职工覃某某利用其手机编造了“明天全桂平超市关门，隔离地点在功德山庄”、“疑似病例和武汉地区的人员1200人全部隔离在功德山庄”两条虚假疫情信息，并散布到“务林员”微信群（共138人）。当日21时20分，桂平市社坡林业站副站长吴某某将“务林员”群上覃某某编造的两条信息转发到“艺术与哲学玉兰堂”微信群（共71人）及“社坡核算中心报账群”（共27人）。1月30日，桂平市公安局依法对覃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吴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同日，桂平市监委决定对覃小军和吴宗钊两人进行立案调查。

### 保密提示



微信办公导致泄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十八条第七款“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未采取保密措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中传递国家秘密”，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微信办公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和发展趋势，本来无可厚非，问题并不在于微信本身，微信办公导致泄密的真正原因还是机关单位保密管理松懈，对干部职工保密教育培训不够，干部职工保密意识淡漠。

### 应对措施

机关、单位要加强保密宣传教育，把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层层传导到每一个人。领导干部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做到经常提醒，干部职工不仅要保证自己不使用微信传密，发现此类情况还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原则上不提倡使用微信办公，因工作需要组建的工作群，交流内容应严格限定为周知性的一般信息，禁止传播一切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禁止涉密人员使用微信办公。

将涉密载体全过程管理与智能手机使用保密管理结合起来，从源头上消除涉密文件数字化的隐患。

（来源：黔微普法综合网信，湖南、广西纪检监察网，工人日报客户端）

## 不容忽视！涉密会议保密管理应该这样做

涉密会议，是指机关、单位召开的议题、内容或者文件涉及国家秘密的会议。做好涉密会议的保密管理，是在机关、单位保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强化涉密会议保密管理，保密法第三十一条和保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了涉密会议主办单位的保密责任和工作要求。但与此同时，相关泄密案件仍有发生，提醒我们需正视涉密会议保密管理工作存在的隐患。

### 管理工作存疏忽，涉密会议竟泄密

#### 一、涉密载体管控

根据保密法规定，保管涉密会议的相关涉密载体，应保障其安全，防止被知悉范围外人员接触。但是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保密制度执行不严，导致涉密载体“不翼而飞”的情况出现。

案例 1：设备管理太大意，涉密电脑竟被盗。某单位在涉密会议召开期间，一台存有涉密文件的涉密笔记本被盗。经查，该单位工作人员在休会期间，未及时将放置在桌上的涉密笔记本电脑存放在保密柜中，被人顺手偷走。后经有关部门全力侦查，笔记本电脑被追回。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对该单位负有直接责任、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 二、会议材料发放

保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应根据涉密会议的内容限定参加人员范围，就是为了保证将国家秘密控制在保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知悉

范围”内。因此，涉密会议文件材料的发放，必须严格限定在会议方案规定的人员范围内。但有些单位工作人员却认为只要是参会人员，就是涉密会议材料的发放对象，导致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被违法扩大。

案例 2: 会务人员要材料，不守纪律致泄密。某单位为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决定召开工作会议，学习相关涉密文件。按照会议要求，只有正式参会人员才可领取学习文件，会务人员不在发放范围内。但会议期间，会务人员郭某向文件保管人员徐某索要上述文件，徐某碍于情面答应其要求。郭某后来将文件泄露给他人，几经转发，造成泄密。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郭某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徐某行政记大过处分。

### 三、会后保密管理

涉密会议结束阶段的保密管理同样不容忽视，应当按照国家保密规定管理会议相关的涉密载体，不得由参会人员私自留存。在一些违法案件中，由于个别人保密意识淡薄、保密知识缺失，更兼涉密会议组织者工作不到位，导致涉密会议结束后文件资料失控的情况屡有发生。

案例 3: 会议结束不交还，文件被窃遭处分。某涉密单位干部孙某参加涉密会议，会议要求涉密会议材料“会后收回”。孙某未按要求交回材料，而是将其带入宾馆，存放在更衣柜中。孙某外出时，涉密会议材料和个人财物被盗，经多方查找未果。事件发生后，孙某受到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 国家秘密无小事，规范管理不容缓

由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涉密会议管理工作实际和制度规范仍存在较大差距。且随着市场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涉密会议、活动场所

选择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服务人员更加复杂，技术防护难度加大，都使涉密会议管理成为单位保密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为防止涉密会议成为“泄密通道”，切实保护国家秘密安全，机关、单位应从以下方面加强涉密会议管理工作。

一、明确保密要求。机关、单位应当根据“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涉密会议管理职责。特别是主办单位要对承办单位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其落实保密管理措施，提供安全保密的环境、设施和设备，对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要求其明确职责、做好保密服务保障工作。

二、规范保密管理。会议期间，主办单位应对参会人员专题保密教育，强调保密纪律要求；做好会场保密保障和场外可疑无线信号监测；跟踪会议文件、资料发放情况，对会议驻地进行保密巡查。会后应督促做好文件、资料的清退、回收、销毁和保密设备回收等工作。

三、严格保密审查。与此同时，机关、单位还应严格涉密会议的新闻宣传报道保密审查。会议相关人员接受采访应当经过批准，会议信息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不得公开宣传报道，以防新闻泄密事件的发生。

（来源：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规划与政策研究室、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网站）